

# 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刘中民

**【摘要】**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典型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首先,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转型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其次,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客观具体。就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形式、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最后,本文研究了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复杂影响。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思潮,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总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异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关键词】**世界政治;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民主化

**【作者简介】**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原文出处】**《国际政治研究》(京),2021.6.33~55

作为一场长周期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阿拉伯之春”已经延宕十年有余,并引发了两轮政权更迭。在2011年的第一波浪潮中,突尼斯、埃及、也门和利比亚政权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被更迭;在2019年的第二波浪潮中,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政权在民众抗议浪潮的压力下倒台。如果从阿拉伯国家转型的进程和效果出发,把民主化、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等综合指标作为评价依据,当今的阿拉伯国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受“阿拉伯之春”和长期外部干预影响陷入严重冲突动荡的国家,主要包括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sup>①</sup>它们均面临战后重建、国家建设和国家转型的多重任务;第二类是2019年下半年以来受第二次“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国家,主要是苏丹、阿尔及利亚,目前仍处在艰难的政治过渡进程之中;第三类是埃及和突尼斯代表的处于政治经济

转型关键期的国家,其形势虽有所好转,但依然远未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第四类是面临转型压力的国家,主要包括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以及约旦、摩洛哥等,即中东地区的所有君主制国家,它们都面临通过改革增强国家治理能力的严峻任务。<sup>②</sup>

从上述四种类型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十分复杂,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准确判断“阿拉伯之春”对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影响,是一件异常困难的学术任务。充分重视阿拉伯国家发展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尤其是结合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重要变量,充分考虑这些变量在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共性和差异,围绕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尤其是因果关系进行辩证认识,无疑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笔者曾以国内学者较多使用的“中东变局”为核心概念,对“阿拉伯之春”的基本问题进行过专文分析。从总体上看,“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它是继20世纪50—60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70—80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发生的第三次地区性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增强民主、改善民生是其主要政治诉求,民众和政治反对派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抗议浪潮是其典型表现形式。“阿拉伯之春”既有共性特征,但在不同国家又有巨大的差异性,其共性特征主要包括:以民众抗议浪潮为主要形式;以改善民生、增强民主为主要政治诉求;缺乏独立的领导阶层和政治理念;以青年为主体力量;广泛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体;具有显著的地区性、跨国性特征。其差异性主要包括:首先,共和制国家抗议浪潮的程度和效果明显高于君主制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的四个国家和陷入内战的叙利亚均为共和制国家;其次,抗议浪潮在不同国家引发政治危机的程度及形式不同,基本上体现了从突尼斯、埃及的和平抗议,到也门的部族冲突,再到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内战烈度逐渐提高的三个层级;再次,外部力量的干预方式和干预程度不同,美欧对阿拉伯国家政治进程的干预采取了典型的实用主义策略,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了军事干预(利比亚)、外交施压(埃及、突尼斯)、多种手段并用(叙利亚)、外交庇护(巴林)等不同手段,体现了明显的多重标准。<sup>③</sup>

“阿拉伯之春”的发生既有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与社会矛盾等同构性的内部深层原因,同时也受到全球化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扩展、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从内外因关系的角度看,中东内部矛盾的长期累积是导致中东变局的根本原因。在政治领域,严重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意识形态危机、老人政治等是阿拉伯国家陷入动荡的主要根源。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阿拉伯之春”的根源在于发展的危机尤其是

发展模式的危机,其突出表现是经济结构脆弱和经济政策失误,使阿拉伯国家难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腐败和两极分化严重、青年人口比例较大与高失业率、高通胀率、高贫困率等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导致阿拉伯国家群体性动荡的直接诱因。在对外政策上的失误也是导致阿拉伯国家陷入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在思想文化领域,自由主义和传统伊斯兰思想精英和知识分子都对阿拉伯伊斯兰社会积弊有深刻的批判。<sup>④</sup>

本文不拟对“阿拉伯之春”的性质、原因、影响以及西方干预等学界探讨较多的问题进行分析,<sup>⑤</sup>而是主要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大较为复杂的领域,对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若干核心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议题在阿拉伯社会有其典型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影响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趋势的核心问题。

### 一、伊斯兰主义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

伊斯兰作为一个包含宗教、文明、社会等多层次内容的综合体,其与民主的关系异常复杂,本文无意也无力就此进行全面探讨,仅讨论作为政治思潮、社会运动和政治力量的伊斯兰主义在“阿拉伯之春”中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影响。伊斯兰主义,学界也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政治伊斯兰,是指主张按照伊斯兰原初教旨变革现实社会的一种宗教政治思潮及随之而来的一场反对世俗化和西方化,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运动。伊斯兰主义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sup>⑥</sup>1928年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的标志。

客观而言,伊斯兰主义力量并非“阿拉伯之春”的领导者,它们也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引领“阿拉伯之春”的发展方向。它们更多是在经过观望

后,在政权更迭后的阿拉伯国家通过选举等政治参与而取得政权,因此它们是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跃居政治舞台的中央的,其典型代表是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sup>⑦</sup>两者的共性是都经历了从得势到失势的过程,但二者的命运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较成功地融入了政治转型进程之中,并且实现了伊斯兰主义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间的相互妥协和包容,这也是突尼斯在“阿拉伯之春”中成为唯一转型相对成功国家的原因之一。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它组建的自由与正义党领袖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先是于2012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随后很快在2013年因军人干政而沦为阶下囚,穆斯林兄弟会也遭到埃及政府的严厉打压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关系又重回1952年纳赛尔“军官革命”以后的对抗状态。

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穆斯林兄弟会在“阿拉伯之春”中截然不同的命运,再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如何认识伊斯兰与民主化的关系。在“阿拉伯之春”之前,在西方最为盛行中“伊斯兰例外论”(Islam Exceptionalism)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伊斯兰文明存在先天缺陷,难以容纳现代化、民主化和世俗化,其原因在于伊斯兰教因坚持“真主主权”而反对人民主权,<sup>⑧</sup>进而反对民族国家、世俗政权及代议制;伊斯兰社会缺乏平等,广泛存在对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歧视。<sup>⑨</sup>其次,伊斯兰主义力量利用民主制度进行政治参与只是夺取权力的手段,而真正目标是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sup>⑩</sup>其结果是民主被伊斯兰主义劫持。在西方只有少数的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伊斯兰教既可以用来支持专制,也可以用来支持民主;<sup>⑪</sup>伊斯兰的协商、公议等传统经过重新解释,可以成为支持民主议会制、代表选举制的观念。<sup>⑫</sup>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非洲研究院研究员王林

聪的总结,穆斯林学者关于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有三种观点,即伊斯兰与民主对立论(主要是伊斯兰主义的观点)、伊斯兰与民主相容论和伊斯兰特色民主论(主要是伊斯兰改革主义的观点)。<sup>⑬</sup>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是一种不确定的关系。伊斯兰教既能用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反对或支持的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同伊斯兰教发生关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sup>⑭</sup>

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典型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在突尼斯和埃及转型过程中的不同命运表明,伊斯兰主义力量与民主的关系存在从包容到冲突的不同形式,进而以复杂的现实证明了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的命题。

(一)突尼斯模式: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化、世俗化的包容与妥协

在突尼斯的政治转型中,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经历了在制宪议会选举中得势到总统选举中失势,再到在议会选举占据多数席位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与世俗力量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但二者基本上实现了相互包容和妥协。尽管无法确定未来突尼斯的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化、世俗化的关系一帆风顺,但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的积极价值。

首先,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参与表现出了适应时代潮流并与现代性相融通的温和性。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的领导人拉希德·加努西(Rashid Ghannushi)明确指出,伊斯兰应该是“活生生的伊斯兰”,而不是“博物馆中的伊斯兰”。<sup>⑮</sup>因此,该党明确否认其宗教性质,强调学习土耳其模式,实行温和的伊斯兰化,同时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主张将伊斯兰与现代性相结合;强调伊斯兰教法在突尼斯没有生存空间,承诺支持政治多元化,把突尼斯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世俗的多党民主制国家。<sup>⑯</sup>

其次,在制宪议会选举得势到总统选举失势的过程中,尽管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也有强化伊斯兰主义内容的图谋,但在遭到世俗力量抵制后它能够与世俗力量妥协;在总统选举失败后,它也能够接受失败的结果,进而展示出了民主化进程所需要的包容和妥协。

在2011年的制宪议会选举后,取得多数席位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与世俗政党共和议会党和劳动自由民主论坛组成执政联盟,使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在初始阶段就具有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世俗力量共享权力的特点。在组建联合政府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与世俗政党联合执政的蜜月期很快结束,双方围绕政治体制、宗教地位、妇女权利方面的分歧不断加剧。<sup>①</sup>此后,世俗政党统一民主爱国党和人民阵线党的领导人于2013年遭暗杀,联合政府发展经济乏术等问题,导致突尼斯2013年7月再次爆发要求政府下台的大规模抗议浪潮。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主导的联合政府于2014年1月将权力移交给由技术官僚组成的临时政府,这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审时度势后做出的第一次妥协。尽管这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被迫做出的选择,但也展现了其肯于妥协的灵活性。

伊斯兰主义力量和世俗力量的矛盾并未因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的首次妥协而结束。2014年10月,世俗政党呼声运动党在立法议会选举中获胜,超越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立法议会选举失势的情况下,面对世俗力量与伊斯兰主义力量有可能走向政治极化的风险,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再次选择了妥协,宣布不参加竞选,呼声运动党领袖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战胜临时总统蒙塞夫·马尔祖基(Moncef Marzouki)成为首位民选总统;2015年2月,融合世俗政党、伊斯兰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等各种政治力量,包含41位内阁成员的新政府成立。<sup>②</sup>在此次选举中,最为值得肯定的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审时度势,未因贪恋权力而与世俗力量进行全面抗

争,而是选择急流勇退,避免了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对抗以及可能发生的冲突,也使突尼斯国内外打消了对该国发生全面伊斯兰化的忧虑。

2019年10月,在因突尼斯现任总统埃塞卜西逝世而提前进行的总统选举中,政治素人凯斯·赛义德(Kais Saied)以72.71%的选票当选为总统。政治素人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此前由呼声运动党组建的联合政府在治国理政尤其是发展经济方面乏善可陈。在总统选举的同时举行的第二次直选的议会选举中,获得52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取代仅获得14席的呼声运动党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sup>③</sup>并依据宪法获得了由该党出任政府总理的机会,使得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继续参与突尼斯的政治转型。

总之,在2011年以来的突尼斯的政治转型中,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世俗力量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合作、斗争、妥协、再合作的磨合,在此过程中,“伊斯兰复兴运动抛弃了伊斯兰主义政治目标,选择了与世俗政党开展合作进行联合执政,在民意支持上获得复苏。世俗政党也改变了过去坚决反对伊斯兰政党的主张,逐渐包容伊斯兰主义思想”。<sup>④</sup>尽管突尼斯相对成功的民主转型是多种因素的产物,其未来也还存在不确定性,但伊斯兰主义力量和世俗主义力量之间的相互适应、妥协和包容,展示了伊斯兰主义可以与民主兼容的前景。

(二)埃及模式: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化、世俗化的对抗与冲突

埃及的情况与突尼斯恰恰相反,穆斯林兄弟会大起大落的背后是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对抗和冲突。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11年2月到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会组建的自由与正义党在选举政治中迅速崛起,其领袖穆尔西当选为埃及总统;从2012年6月到2013年8月,是穆斯林

兄弟会短暂执政的时期,它与世俗派尤其是司法部门、军方的对立不断加剧;2013年8月以来,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领导的军方利用民众抗议浪潮废黜穆尔西政权,穆斯林兄弟会被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遭到沉重打击。

伊斯兰主义力量在埃及的命运之所以与突尼斯截然不同,原因非常复杂,尤其是与军方在两国政治转型中的角色不同密切相关,但仅就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力量的关系而言,有以下两点值得总结的教训。

首先,穆斯林兄弟会在执政后未能履行实行温和、多元政策的承诺,逐步向自身垄断权力和推行伊斯兰主义路线偏离,进而激化了与世俗阵营的矛盾。穆尔西曾宣称,自由与正义党没有宗教性质,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政党,而是公民政党;它支持政治多元化发展,主张取消紧急状态法,恢复公众自由,允许自由组建政党,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主张在维护伊斯兰价值观的同时,实行制宪会议和政治改革;坚持世俗化路线,采取渐进方式对社会进行变革。<sup>①</sup>但是,在执政过程中,穆尔西政府却未能妥善处理与军方、司法部门等世俗力量的关系,并且不断谋求垄断权力。在穆尔西的几次政府改组中,他不断撤换非穆斯林兄弟会势力的部长,加强穆斯林兄弟会的权力。2012年11月,穆尔西发布宪法声明,宣布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其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及决定在新宪法和议会产生前都是最终决定,因此被反对派称之为“新法老”。<sup>②</sup>经过2013年5月的政府改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内阁中占据的席位由8个增加到10个;穆尔西还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埃及的27个省中,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省长达11人,其中7人为2013年6月任命。<sup>③</sup>

在组织制宪和施政的过程中,穆尔西政府始终存在偏离世俗主义、推行伊斯兰主义的倾向。例如,穆尔西上台不久就力图影响制宪过程,他曾经发布规定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为主要立法源

泉的宪法声明;2012年11月,由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伊斯兰主义力量主导的制宪委员会通过宪法草案,规定伊斯兰教法原则为国家主要的立法源泉,并在遭到反对后举行全民公投,在仅有32.9%投票率的情况下,以63.8%的赞成票通过宪法,<sup>④</sup>这是导致穆斯林兄弟会与世俗力量彻底撕裂、世俗派组织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即“二次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埃及伊斯兰主义力量与世俗力量缺乏基本的信任和共识,双方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互相设置障碍,互相否决,这是导致穆斯林兄弟会失败的重要根源,也是埃及宗教与世俗矛盾尖锐的真实反映。

一方面,司法部门和军方不断为穆斯林兄弟会掌权设置障碍。在2011年11月的人民议会(下院)选举和2012年2月埃及协商会议(上院)选举中,自由与正义党和光明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大获全胜,控制了立法机构,埃及宪法法院却于2012年6月宣布选举违宪,下议院被迫解散。在遭穆尔西发布总统令否决后,最高宪法法院又裁定穆尔西的总统令无效,迫使穆尔西不得不宣布尊重最高法院的裁决。此后,穆尔西与司法部门的冲突持续不断。在总统选举前,为防范穆斯林兄弟会当权,埃及军方于2012年6月17日发布补充宪法声明,宣布在新人民议会选举产生之前,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收回制宪立法权、对外宣战权以及国家预算决策权等核心权力。

另一方面,穆尔西也不断通过行使和扩张总统权力对世俗力量的决定进行否决。例如,2012年7月,穆尔西在就任总统不久后便发布第11号总统令,撤销解散议会的决定;8月,穆尔西在解除了国防部长坦塔维和总参谋长阿南以及海军司令、防空军司令和空军司令职务同时,下令取消军方6月发布的补充宪法声明,同时颁布新宪法声明,收回立法权。<sup>⑤</sup>

2013年6月底,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政权,穆

尔西执政时期制定的宪法中止,新的制宪委员会重新制定宪法;2014年1月,埃及通过新宪法,新宪法禁止宗教政党活动,穆斯林兄弟会对埃及民主化进程的参与以彻底失败告终。

综上所述,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突尼斯和埃及的两个案例表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典型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它们在突尼斯和埃及转型过程中的不同命运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

## 二、军人干政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

长期以来,军人在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学者认为其原因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阿拉伯国家,军队往往代表相对先进的力量,具备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条件;其次,阿拉伯较为落后的社会结构和部族文化形成“强者为王”的思维定式,这为军队干政提供了适应的外部环境;最后,中东国家面临的安全难题,客观上需要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sup>④</sup>因此,中东国家的军队不仅是指导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工业化、制度化和改革的理想工具,还是威权主义实现稳定的关键变量。<sup>⑤</sup>

但是,在“阿拉伯之春”中,这些军人当道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则成为政权更迭的重灾区,而这些国家又多是军人阶层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建立的政权,如埃及、也门、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其中,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和也门萨利赫政权在2011年第一波“阿拉伯之春”中倒台,苏丹巴希尔(Omar Hasan Ahmad Al-Bashir)政权、阿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Abdelaziz Bouteflika)政权则在2019年第二波“阿拉伯之春”中倒台。在上述国家中,除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被美国推翻外,只有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艰难存续至今。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军人阶层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中的作用。非常耐人寻味的是,相对于以往中东国家历史上比较纯粹的军人政变,在“阿拉伯之春”中几乎找不到军队直接凭借武力夺取政权或进行暗杀夺权的典型军人政变,但军人阶层在阿拉伯国家转型中又的确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总体趋势上看,相对于过去,军人在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呈现出既利用民主程序又依靠实力施压的隐性和柔性特点,这应该不失为一种微弱的进步,因为慑于民意、舆论和民主程序等压力,军人阶层越来越无法直接发动赤裸裸的军事政变。因此,在“阿拉伯之春”中并未出现直接的军事政变。但是,如何准确评估军人阶层在“阿拉伯之春”中的作用十分困难。

首先,军人在原政权倒台和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十分复杂。它既可能在现政权的命令下镇压民众抗议,也可能表面上弹压民众抗议但并不全力镇压;既可能敷衍观望静待尘埃落定,也可能表面上站在民众抗议一边向原政权施压,但实为发动隐性政变。例如,在埃及政治转型的过程中,军人几乎在不同的阶段发挥了上述所有作用,甚至更多的作用。

其次,从政治转型结果的角度评价军人阶层的作用更加困难。评价政治转型,需要把民主、稳定和发展等结合起来进行辩证评价。如果徒有选举等程序民主,而没有稳定和发展,这无疑是失败的民主转型。另外,在阿拉伯共和制国家中,军方还往往是世俗力量的代表,军人干政往往具有捍卫世俗化、防范伊斯兰力量建立伊斯兰主义政权的作用。这些内容都涉及如何客观评估民主与威权以及在复杂现实中合理平衡二者的关系。

在强调军人作用复杂性的基础上,结合军人阶层在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作用的大小和差异,可以把军人阶层的作用划分为以下几种方式。

### (一)突尼斯方式: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

在突尼斯民主转型中,军人阶层基本未对民主转型施加影响,同时国家基本保持稳定,这是突尼斯民主转型相对成功的标志。因为突尼斯既没有像埃及那样回归军人威权,也没有像也门、利比亚那样陷入内战和部落冲突。因此,有学者认为,军队在突尼斯和埃及两国政治中的地位以及不同的转型环境是决定两国民主转型一成一败的结构性原因。<sup>②</sup>

突尼斯的民主转型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军方自始至终发挥不干预政治的局外人作用;二是各主要政治势力达成了政治妥协。突尼斯的军队之所以未像其他阿拉伯共和制国家那样长期干政,与突尼斯军队在其形成和发展进程中相对独立的传统有关。首先,突尼斯军队并非由独立战争中反法殖民斗争的战士组成,而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军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突尼斯军队并非像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那样成为国家的缔造者。其次,突尼斯独立后,无论是文人出身的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总统,还是通过军人政变上台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总统,都严格限制军队的作用和规模。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将军方的职责限定在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范畴;为防止军人政变危及其统治地位,规定凡是在安全部门任职的公民不得参与选举;缩减军队规模,压缩军费开支,使突尼斯军队人数控制在四万左右。<sup>③</sup>

因此,突尼斯不同于埃及等其他中东国家,军人阶层未能形成权力和利益相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其干预政治的动力也因此大大缩小。“突尼斯军队的职业化和远离政治的传统使其在革命后迅速回归军营”,<sup>④</sup>使突尼斯对民主转型较少受到军人干政的影响。禁止军人干政也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立法得以制度化,2014年颁布的突尼斯宪法明确规定,武装部队“必须保持完全中立”。<sup>⑤</sup>当然,军队未对民主化进程进行干预还有很多其

他因素,如突尼斯国民同质性较强,使其避免了部落、教派、部族冲突的干扰,其外部安全压力也较小,不像埃及长期处在阿以冲突前线。

### (二)埃及方式: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

军队在埃及社会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军队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2011年以前,三位总统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都无一例外地来自军人阶层。埃及军队的特征和作用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团队意识的明确化,军人作为埃及民族主义的代表,是埃及共和国的创立者、建设者和保卫者;团体利益的特殊化,军人阶层是有着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团体行动的自主化,军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具有独立于文官政治系统的自主性。凭借自身掌握的资源对内政外交施加影响,并且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其行为选择。<sup>⑥</sup>有学者甚至称埃及军队为一块独立的“飞地”。<sup>⑦</sup>鉴于学界对军队影响埃及政治进程的情况较为熟悉,以及前文在探讨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政治转型时对军队也已有所涉及,这里主要强调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军队对埃及政治转型的干预的全面性。军队在埃及政治转型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从2011年“1·25”革命到2月11日穆巴拉克辞职,埃及军队先是在抗议民众和穆巴拉克政权之间态度矛盾,但最终转向不镇压民众抗议并对穆巴拉克施压,成为穆巴拉克政权垮台的核心原因之一。从穆巴拉克辞职到2012年6月穆尔西当选为埃及总统,军方领导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导了埃及的政治过渡进程,期间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围绕议会选举、立宪和总统选举进行了复杂的博弈。从2012年7月到2013年7月,即穆斯林兄弟会执政期间,埃及军队与穆尔西政权貌合神离,并在妥善把握民主与秩序、世俗与伊斯兰、穆尔西政权与反对派关系的基础上,准确拿捏政治节奏,直至废黜穆尔西政权。在2013年7月废黜穆尔西政权后,军方先是还政于过渡政府,后又由军方代

表塞西参加总统选举,并两次取得选举胜利,同时采取打击穆斯林兄弟会、发展经济、整肃极端主义等举措,把经济和安全作为主要施政任务。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国际舆论对军方在埃及政治转型中的作用尤其是废黜民选的穆尔西政权颇有指责,但埃及军方对政治转型的全程参与,是避免埃及转型失控或陷入严重动荡的保障,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埃及政治的“总节制阀”。<sup>③</sup>

第二,埃及军方对政治转型尤其是民主化影响的复杂性。首先是民主与威权关系的复杂性。在埃及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军队是民主转型的促进者和监护者,军队在民众抗议时期最终选择站在民众一边,在最高军事委员会时期组织议会选举和制宪工作,在总统选举中对穆斯林兄弟会获胜的认可和接受,在废黜穆尔西政权后还政于临时政府,都表现了其接受民主化潮流的一面;另一方面,军队对自身特殊利益的维护、为穆尔西政府设置障碍以及最终废黜穆尔西政府,直至使埃及重回威权体制,又使埃及军政关系有重回穆巴拉克时代之嫌。其次是伊斯兰、民主、世俗化关系的复杂性。如前所述,埃及军队是世俗化的维护者,但其废黜穆尔西政权的做法又无疑是对民主的伤害。因此,军队在埃及政治转型进程中是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护者,也是世俗主义的捍卫者,但同时也是军队利益的维护者和威权体制的重塑者。

总之,埃及军队在政治转型进程中体现出了它对威权和秩序的偏好,其态度也经历了从观望、中立到积极干预的转变。埃及军队及其建立的威权体制固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但它又是当下避免使埃及陷入动荡和无序的现实选择。这也恰如塞西在2013年6月23日对穆尔西政府的最后通牒中所言:“军队是有道德感的群体,我们有责任避免埃及滑向混乱、派系冲突、国家崩溃的深渊。”<sup>④</sup>当然,当前具有军政体制色彩的塞西政权仍面临宗教与世俗、民主与威权、安全与发展等一系列矛

盾的挑战,其核心是解决“阿拉伯之春”的两大核心诉求——民主和民生。

在北非地区,在2019年发生政权更迭的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军方在其政治转型中的作用与埃及有相似之处。截至目前,军队在向苏丹巴希尔政权、阿尔及利亚布特弗利卡政权施压促使其和平交权,主导过渡时期政治进程方面,军队发挥的作用都和埃及军方相近,其具体情况和最终结果都值得关注和研究。

(三)也门方式:部落化的军队与碎片化的政治转型

也门作为一个典型的部落国家,其军队至今也无法摆脱的部落化特征。<sup>⑤</sup>在1978年萨利赫任总统之前,也门政治为内战和政变所充斥,其中都有部落势力的影响。<sup>⑥</sup>尽管也门政府也试图通过改革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但始终无法改变军队结构部落化的痼疾,导致军队高度分裂和脆弱。<sup>⑦</sup>当然这种痼疾的形成既与也门社会的部落传统有关,也与也门政府尤其是国家领导人把部落作为政治操控的工具密切相关。

1978年萨利赫任总统后,也门政权与军队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sup>⑧</sup>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门政府利用也门社会的部落结构,通过赋权给关键部落、在军队中大力扶持关键部落,换取关键部落对政府的支持,形成政权与部落之间的庇护网络。萨利赫通过对部落、军队和政府精英进行相互内嵌实现利益均沾,把部落、军队和各界精英构建成“部落—军队—商人复合体”,<sup>⑨</sup>同时通过政治权术进行平衡,来维护也门的政权稳定。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1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萨利赫试图利用美国和沙特支持也门反恐打击“基地”组织的机会,通过组建由其自身和家族控制、与常规国家军队平行的武装力量,<sup>⑩</sup>以及改革军队削弱部落对军队的影响。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导致萨利赫政权与军队和部落的矛盾日趋尖锐,这是军队和部落精英在2011年

支持民众抗议浪潮,迫使萨利赫下台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部落和军队精英迫使萨利赫和平交权在本质上并非对民主的支持,而是其自身利益和所在,也是也门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反映。

2011年4月,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尤其是沙特的斡旋下,萨利赫和平交权,也门进入政治转型时期,这种和平过渡的方式还一度被国际社会称为“也门模式”。但军队部落化的痼疾使新任总统哈迪(Abdrabuh Mansur Hadi)继续通过军队部落化、家族化清除异己力量,教派武装(如胡塞武装)和地方武装(如南方的分离力量)、极端力量(“基地”组织)等多重武装力量对抗政府,加之沙特等外部力量的干预,导致也门的政治转型很快为政治力量的碎片化所取代。

在也门政治转型中,军队部落化对政治转型失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哈迪总统以军队部落化的方式清除萨利赫家族和穆赫辛(Ali Mohsen al-Ahmar)家族的军事高官,<sup>④</sup>用来自南方他本人所在的部落军官加以取代,这无疑是以新的部落化取代传统的部落化,其后果可想而知。2012年,哈迪先是解除了4名省长、20多名高层军事指挥官的职务,其中包括多名萨利赫系高官。<sup>⑤</sup>随后哈迪又解除了穆赫辛将军的职务,并将其控制的第一装甲师进行重组,统一听从国防部的调配。在也门军队重组过程中,哈迪重用南方系军官,有意打压包括萨利赫系与穆赫辛系在内的北方人。哈迪的做法激怒了两个实力派系,在哈迪上台一年半内,也门至少有22个旅发生过兵变。<sup>⑥</sup>此外,萨利赫本人及其派系之所以一度转向与什叶派胡塞武装结盟,共同反对哈迪政府,也与哈迪在政府和军队改组中对萨利赫派的排斥密切相关。

其次,什叶派胡塞武装除对哈迪政府民族和解大会结果和政府取消石油补贴不满外,对哈迪政府未能在军队中安排两万胡塞武装民兵也强烈不满。<sup>⑦</sup>胡塞武装的诉求无疑也是也门历史上部

落寻求加入军队一部队庇护网络的做法。此外,萨利赫派和其他部落派系的军队之所以在打击胡塞武装的过程中敷衍了事,甚至加入胡塞武装的做法,都是军队部落化的表现。

再次,在原有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对抗的格局下,原本与政府合作的“南方过渡委员会”在沙特与哈迪政府长期打击胡塞武装未果的情况下,开始于2020年4月自立门户谋求南方七省“自治”,其武装力量与政府军爆发冲突,<sup>⑧</sup>这不仅也是军队部落化的表现,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也门政治的碎片化。

总之,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该客观具体。在突尼斯、埃及和也门三个案例国家中,军人干政的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就中东国家军人干政的发展趋势而言,尽管它会继续存在,但它日益受到民主程序的规制,典型军事政变呈现颓势。

### 三、身份政治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

身份政治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准确的概念,并没有明确、公认的内涵,它在广义上是某些群体身份引入政治或政治化的行动或做法。<sup>⑨</sup>身份政治日趋突出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现象,但它在中东地区更有其独特性。在西方,身份政治更多是在民主体制下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等少数群体围绕自身权利进行抗争,当然也有走向极端化的社会冲突,但它基本不会涉及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但在中东地区,身份政治则主要表现为与国家构建相联系的严重的族群、教派、部落冲突及其外溢导致的跨国和地区性问题,它们也是“阿拉伯之春”以来许多中东国家政治转型和民主化受挫或遭遇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中东地区,基于身份政治的困境既影响民族国家构建,同时又由于民族、宗教、教派的身份

认同具有跨国性,使其不断外溢以致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甚至酿成国际冲突。“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与伊朗的民族和教派对抗,土耳其内政外交中“双泛”复苏,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教派冲突等,均是中东身份政治困境的表现。<sup>④</sup>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在对“阿拉伯之春”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也已经认识到,阿拉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宗族、教派和部落因素,成为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突出表现为部落忠诚与国家忠诚对立,成为国家认同缺失、政治分裂和社会碎片化加剧的重要原因。<sup>⑤</sup>

从阿拉伯国家内部来看,由宗教和族群矛盾诱发的政治冲突主要有四种类型。其一是权力分割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如黎巴嫩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后)的族裔和教派分权结构;其二是权力垄断族裔化而引发的国内冲突,地位处于边缘化和弱勢的教派和族群往往通过民主抗争的方式改变现有权力结构,如中东变局中的占巴林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反对逊尼派王室的政治抗争;其三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群体的冲突,突出表现为民主转型进程中少数群体的权利保障问题,如埃及基督徒科普特人问题;其四是跨界族群寻求自治与独立引发的冲突,如长期困扰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四国的库尔德人问题。<sup>⑥</sup>在“阿拉伯变局”中,上述四种类型的基于族群和教派的身份政治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来看,族群和教派冲突的外溢、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使阿拉伯国家政治具有密切联动的特点,并对民主转型产生消极影响。<sup>⑦</sup>这种情况在中东变局中表现得更加复杂,其突出表现是地区国家从身份政治的角度对其他国家的政治进程施加影响。例如,在“阿拉伯之春”中,沙特阿拉伯积极支持叙利亚逊尼派反对派颠覆叙利亚政权,但在巴林的民众抗议浪潮中,沙特阿拉伯则选择支持逊尼派王室镇压什叶派抗议。<sup>⑧</sup>其逻辑是沙特在叙

利亚问题上站在反对派一边,在巴林问题上则站在巴林政权一边,但其共性是沙特都站在了与沙特教派相同的逊尼派一边。又如,逊尼派内部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以及围绕支持和反对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也是身份政治影响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体现,其突出表现是在埃及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土耳其和沙特围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竞争,土耳其坚定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而沙特则反对穆斯林兄弟会,并配合塞西政府把穆斯林兄弟会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sup>⑨</sup>有研究认为,这背后既是围绕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也是争夺泛伊斯兰主义领导权的斗争。<sup>⑩</sup>

基于阿拉伯世界的身份政治突出表现为族群、部落和教派问题,并在国内政治、地区政治两个层面产生影响,加之篇幅所限无法对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的身份政治问题进行全面研究,本文通过以下两个案例,揭示族群和教派的身份政治在国内和地区两个层面对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影响。

#### (一)巴林:教派问题对民主化的消极影响

在历史上,尽管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但它在本质上始终是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在宗教领域的反映。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伴随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世俗化进程的加深一度使教派矛盾走向相对沉寂,甚至出现教派对话的趋势。<sup>⑪</sup>但是,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尤其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0年以来的中东变局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中东政治中的教派矛盾不断被激活,并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sup>⑫</sup>

具体来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导致的教派矛盾源于作为什叶派大国伊朗“输出革命”战略,导致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什叶派骚乱、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抵制伊朗“输出革命”都具有教派斗争的色彩。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教派矛盾源于萨

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什叶派地位的上升,以及伊朗影响的增强,被沙特等海湾国家视为什叶派扩张。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教派政治作为身份政治的表现主要在于国内和地区两个层次,国内层次表现为巴林、叙利亚、也门等存在教派问题的国家当政者都利用教派认同进行政治动员,使政府与反对派的斗争被建构为教派斗争;国际层次在于部分国家从教派异同出发决定对他国的政策,甚至进行干预,如沙特支持巴林逊尼派王室镇压什叶派抗议、组建阿拉伯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美国甚至也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教派矛盾进行利用。

在“阿拉伯之春”中,基于教派问题的身份政治在巴林、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都有主要影响,这里仅以巴林对教派问题引发的身份政治的逻辑进行说明。

巴林是海湾地区的小国,在其120多万人口中,本国公民约55万人,其余为外来劳工;在巴林公民中,约70%为什叶派,但政权却长期掌握在占人口30%的逊尼派手中。<sup>⑤</sup>1979年,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巴林出现了以伊斯兰解放阵线(the Islam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Bahrain, IF-LB)为典型代表的什叶派政治反对派组织;<sup>⑥</sup>20世纪90年代,巴林什叶派反对派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反对王室政权对什叶派的歧视,呼吁政府解决公民和政治权利缺失和经济停滞,是什叶派反对派的主要诉求,逊尼派王室政府则对什叶派进行了严厉镇压,甚至把部分反对派领导人驱逐出境。<sup>⑦</sup>21世纪初,巴林王室许诺进行包括增加什叶派权利的改革,但并未兑现,导致什叶派的反政府抗议和教派冲突此起彼伏,什叶派的诉求仍是要求取消教派歧视,改善什叶派的社会处境,这种抗议一直持续到“阿拉伯之春”。

2011年2月14日,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巴林麦纳麦珍珠广场爆发了以什叶派为主体的抗议示威,逊尼派王室政权随即对抗议进行了严厉镇

压,但一直难以控制局面。2011年3月14日,沙特领导军队以海湾合作委员会名义出兵巴林,帮助巴林王室镇压了民众抗议浪潮,巴林也成为“阿拉伯之春”首先枯萎的国家,其实质是巴林逊尼派王室政权、沙特等海湾逊尼派国家在美国的默许下联手镇压了什叶派为主体的民众抗议浪潮。

巴林民主化进程遭扼杀表现出的基于教派矛盾的身份政治主要包括国内和地区两个层次。<sup>⑧</sup>首先,在国内层面,教派认同是巴林逊尼派王室和什叶派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一方面,逊尼派王室、政治组织和官方控制的媒体积极利用教派因素进行政治动员,不断将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叛乱”,甚至渲染伊朗“入侵巴林”的危险,<sup>⑨</sup>以获取对什叶派进行镇压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什叶派长期所处的边缘处境以及政府的严厉镇压,进一步强化了什叶派的受害者心理和教派认同,这一切都强化了巴林冲突的教派色彩,加剧了教派对立和宗教情绪的极端化,并为外部势力的介入创造了条件。<sup>⑩</sup>

其次,沙特以教派矛盾为由介入巴林事务,教派矛盾沦为沙特抗衡伊朗的重要工具。为防止巴林逊尼派政权倒台,避免巴林建立什叶派政权并倒向伊朗,同时避免什叶派抗议波及海合会国家,沙特主导的海合会国家不断从伊朗威胁的角度强调巴林的教派冲突,并以海合会的名义出兵对巴林的抗议浪潮进行镇压。而伊朗尽管并未直接介入巴林事务,但也从舆论上和外交上对巴林的什叶派抗议浪潮予以支持,其结果是巴林的教派斗争演变为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斗争”。<sup>⑪</sup>

总之,在巴林政治转型中,基于教派认同的身份政治主要体现在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两个层次。在巴林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的身份差异构成了巴林王室政权与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在国际关系方面,沙特从教派矛盾出发,采取了支持巴林逊尼派王室镇压什叶派反对派的政策,而什叶派大国伊朗则选择支持巴林的什叶派

反对派。

## (二) 叙利亚和伊拉克: 作为族群问题的身份政治

众所周知, 库尔德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尤其是英法对中东民族国家体系进行强制性安排遗留的跨界民族问题, 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库尔德民族被分割到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四个国家之中, 他们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连绵不绝, 延续至今。库尔德问题是指由于库尔德人争取从自治到独立的程度不等的民族运动与所在国家产生的矛盾, 以及由于库尔德民族跨界交互影响而产生的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身份政治在其中的表现非常复杂, 既涉及某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向所在国家争取权利的身份政治, 也包括作为分散于四国境内的库尔德民族追求整体性民族权利的合作和斗争, 还包括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土耳其四国政府针对自身和他国库尔德人政策形成的复杂关系, 进而围绕库尔德问题形成了复杂的多层次的身份政治。

本文主要把伊拉克和叙利亚两个阿拉伯国家的库尔德问题纳入身份政治对民主化进程影响的框架下进行简要分析。由于伊朗和土耳其不属于阿拉伯国家, 因此不对其进行独立分析, 但它们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问题的干预也构成了库尔德问题身份政治的一部分。

受“阿拉伯之春”的影响, 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四国都出现了库尔德人争取民主权利的“库尔德之春”, 但叙利亚和伊拉克最为突出。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地区自治区的建立, 尤其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举行“独立公投”, 叙利亚库尔德人提出未来叙利亚实行联邦制的主张, 都将深刻影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治转型进程。从身份政治的角度看, 一方面, 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身份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即库尔德自治区的建立和巩固(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尚不合法); 另一方面, 伊拉克和叙利亚政

府虽然满足了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部分要求, 但又严厉打击(伊拉克)或坚决反对(叙利亚)库尔德人争取独立建国, 而伊朗、土耳其作为相邻存在库尔德问题的国家也极力围堵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独立运动, 土耳其甚至多次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库尔德人, 尤其是对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发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 不仅极大地影响库尔德人的命运, 也对叙利亚危机产生严重消极影响, 进而使身份政治扩大到国际关系和地区政治层面。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 伊拉克库尔德人建立了宪法认可的库尔德地区自治政府, 而2011年以来受“阿拉伯之春”影响又发生了争取民族权利的“库尔德之春”。“库尔德之春”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针对中央政府, 库尔德民众要求更高层次的自治; 针对库尔德自治政府, 库尔德民众则要求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在此过程中, 库尔德自治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围绕财政预算、石油收益分配、争议地区的管辖权问题以及库尔德地区武装等问题展开了复杂的斗争。<sup>④</sup>

2014年以来, 在抗击“伊斯兰国”的斗争中,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进一步扩大了控制区域, 其范围大约占全国领土的1/3; 2017年9月25日举行了“独立公投”, 库尔德自治区92.7%的民众支持独立。<sup>⑤</sup>但是, 这次“独立公投”也成为“阿拉伯之春”以来伊拉克库尔德人身份政治的转折点, “独立公投”遭到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法理否决和军事打压, 伊拉克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公投”违宪, 库尔德武装也被政府军解除。在地区层面, 与伊拉克相邻的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家都强烈反对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 它们不仅取消了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之间的航班, 还在靠近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边界地区举行军事演习。这表明, 对于存在库尔德问题国家, 允许库尔德自治是地区国家满足其身份政治可以忍耐的最高程度, 但绝对不会给库尔德人争取独立以任何空间。

“阿拉伯之春”以来,身份政治在叙利亚库尔德人争取自治权利的斗争中体现得更加突出,因为在2011年以前叙利亚政府根本不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叙政府才开始主动改变对待库尔德人的态度。2011年4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颁布法令,给予登记在册的作为所谓“外国人”的库尔德人叙利亚国籍。<sup>⑥</sup>在叙利亚内战和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叙利亚库尔德人开始积极谋求自治。2015年11月,叙利亚库尔德斯坦自治政府在俄罗斯正式启动,并发表了《罗贾瓦革命宣言》(Rojava Revolution Declaration),宣称叙利亚战后将成为联邦制国家,库尔德人将拥有军队等;2016年3月,库尔德人宣布在叙北部成立包括卡米什利、阿夫林和科巴尼等三个库尔德人聚居区的联邦区,实行经济、社会、安全、国防和文化等领域的自治。<sup>⑦</sup>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是中东地区出现的第二个库尔德人自治地区,它要求把叙利亚变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并开始在学校里教授库尔德语言,同时,由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负责建立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自治机构。<sup>⑧</sup>对于民族身份和民族权利长期遭到压制的叙利亚库尔德人而言,这无疑是有史以来身份政治斗争所取得的最高成果。

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存在,并得到了俄罗斯和美国的认可。尽管叙利亚库尔德人表示只谋求自治而不谋求独立,但其提出的叙利亚实行联邦制的构想无疑将改变或削弱目前叙利亚的阿拉伯国家性质,而且叙利亚政府也绝对不会容忍其独立。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引发的地区政治危机更加严重,尤其是土耳其强烈反对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土耳其认为其国内的库尔德工人党与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关系密切,且把二者都视为跨境活动的恐怖组织。为了打击叙利亚库尔德势力坐大,土耳其已经于2016年和2018年发动代号为“幼发拉底河盾牌”和“橄榄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土耳其的目标是沿着

900公里长的土叙边界在叙北建立纵深30公里的“安全区”,并将大量滞留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阿拉伯难民迁移至“安全区”内,通过改变叙北人口结构割裂库尔德人控制区域,通过建立土叙边界隔离区斩断两国库尔德力量的联系,进而维护土耳其南部安全等多重目标。<sup>⑨</sup>由此可见,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引发了叙利亚国内和国际关系层面异常复杂的身份政治。

综上所述,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影响十分复杂,并作用于国内政治和地区政治两个层次。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民主化会刺激基于身份政治的权利觉醒,但反过来身份政治的复兴又会掣肘乃至破坏民主化进程。在地区范围内,教派、族群问题的外溢和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地区性意识形态,又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

### 结语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在阿拉伯世界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它们对理解“阿拉伯之春”遭遇的挫折有重要的价值。当然,客观认识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澄清外界尤其是西方对于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的误解。

首先,伊斯兰文明是影响阿拉伯世界最大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因素,由伊斯兰政治文化衍生出的政治思潮、政治组织又构成影响阿拉伯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本文仅从作为政治思潮和政治组织的伊斯兰主义与民主化的关系进行案例分析,尽管很难反映伊斯兰与民主关系的全貌,但起码可以证明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就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将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并不断进行调整

与重塑。无论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民主变革都将成为大势所趋,但阿拉伯国家不会照搬西方民主,而是实现具有各自国情和伊斯兰特色的民主。<sup>①</sup>

其次,军人干政是影响“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因素,但也呈现强弱程度不同的多样性和作用的复杂性,就其在“阿拉伯之春”中作用方式的隐性和柔性特征来看,军人干政尽管会继续存在,但它日益受到民主程序的规制,赤裸裸的典型军事政变已呈现颓势。就本文选取的突尼斯、埃及和也门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其原因在于三个国家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也恰如亨廷顿所言:“随着社会变化,军队的角色也就发生变化。在寡头统治的世界里,军人是激进派;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军人是参与者和仲裁人;当市民社会出现后,军人就变成现存秩序的保守的护卫者。”<sup>②</sup>

最后,在阿拉伯世界,基于族群、教派和部落等认同的身份政治,是“阿拉伯之春”在不同国家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社会和文化根源。尽管它更多发挥的是制约和掣肘民主化的负面作用,但也有权利抗争的进步性。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民主化会刺激基于身份政治的权利觉醒,但反过来身份政治的复兴又会掣肘乃至破坏民主化进程。在地区范围内,教派、族群问题的外溢和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地区性意识形态,又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身份政治对民主化的影响异常复杂,坦率地说,受篇幅和所限,本文对身份政治的研究还十分有限。

本文旨在揭示的问题是民主价值的世界性和民主环境的地方性的关系。就世界民主化进程而言,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之所以不同于并落后于其他地区,有着非常复杂的成因。就外因而

言,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遗产,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力干涉与民主输出和民主改造相结合,都是重要的外部原因。就内因而言,阿拉伯世界因民族、宗教、教派、部落等传统社会因素形成了丰富的地方特殊性,并深刻影响和制约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就未来的研究而言,需要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丰富的政治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加强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以深入认识阿拉伯国家政治发展的独特性和地方性。

#### 注释:

①伊拉克尽管并非在“阿拉伯之春”中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但外部干预和民众抗议一直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在2019年第二轮“阿拉伯之春”中,伊拉克也发生了持续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所以经综合考虑,把伊拉克划入此类。

②刘中民:《中东2020:多重危机中的博弈与变局》,《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6日,第8版。

③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几个基本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第3-8页。

④刘中民:《关于中东变局的几个基本问题》,第8-13页。

⑤较系统的著述参见余建华等:《中东变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曾向红等:《社会运动视角下的中东变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中东变局的多维透视》(2012年卷),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2013年卷),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研究》等专业期刊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这里不再赘述。

⑥金宜久:《论当代伊斯兰主义》,《西亚非洲》1995年第4期,第32页。关于伊斯兰主义核心思想的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0-66页。

⑦关于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和穆斯林兄弟会政治参与的情况参见雅言:《“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的选举政治》,《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1期;李竞强:《“阿拉伯之春”以来突尼斯与埃及政治转型比较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⑧伊斯兰主义强调真主安拉对人类的绝对统治权和主宰权,并以此为基础反对民族主义的国家主权观,提出了否定民族国家主权的“真主权论”,以及世俗统治者为其代理人

的“代行主权论”。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毛杜迪(Syed Abul Aala Maududi),他认为理想的伊斯兰国家应当既尊重真主主权,又充分尊重民意;统治者(哈里发)应该成为真主和穆斯林的双重代表。参见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47-148; John L. Esposito, ed., *Voice of Resurgent Isl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17。

⑨关于“伊斯兰例外论”参见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3; Martin Kramer, *Ivory Towers on Sand: The Failure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1; Danniell Pipes, *Militant Islam Reaches Americ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P. Vatikiotis, *Islam and th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1987; Elie Kedourie,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Frank Cass, 1994。

⑩David Pool, "Staying at Home with the Wife: Democratization and Limits in the Middle East," in David Potter, et al., eds.,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213。

⑪John L. Esposito and John O. Voll, *Isla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96, p.7。

⑫[美]约翰·埃斯波西托:《伊斯兰与现代化》,杜红译,《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1期,第18页。

⑬王林聪:《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129页。

⑭同上书,第145页。

⑮Ray Takeyh and Nikolas K. Gvosdev, *The Receding Shadow of the Prophet: The Rise and Fall of Radical Political Islam*, Westport: Praeger, 2004, p.6。

⑯王凤:《中东变局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发展趋势》,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2年卷),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⑰关于政治体制,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主张议会制,世俗政党主张效仿法国的半总统制;关于宗教的地位,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偏向强化国家的伊斯兰属性,其激进派别甚至主张建立实行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显然与世俗政党的目标相左;关于妇女权利,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不愿意把性别平等纳入宪法,而世俗派强调性别平等。参见 Laura K. Landolt and Paul Kubicek,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Comparing Tunisia and Egypt to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Democratization*, Vol.21, No.6, 2014, p.11; 雅言:《“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的选举政治》,第11页。

⑱雅言:《“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的选举政治》,第12页。

⑲ "Tunisia: Habib Jemli Tasked with Forming a New Government,"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9/11/tunisia-habib-jemli-tasked-forminggovernment-191116072758961.html>, 2021-04-15。

⑳雅言:《“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的选举政治》,第12页。

㉑王凤:《中东变局与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发展趋势》,第101-103页。

㉒余建华等:《中东变局研究》(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页。

㉓陈天社:《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转型》,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3年卷),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

㉔余建华等:《中东变局研究》(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页。

㉕李竞强:《“阿拉伯之春”以来突尼斯与埃及政治转型比较研究》;陈天社:《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转型》,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3年卷),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122页。

㉖田文林:《军队干政:中东非典型政治中的典型现象》,《世界知识》2012年第3期,第33页。

㉗Steven A. Cook, *Ruling but Not Governing: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gypt, Algeria, and Turke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

㉘Jason Brownlee, et al., *The Arab Spring: Pathways of Repression and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03。

㉙详尽讨论参见张楚楚:《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国家建构路径:基于“突尼斯模式”与“也门模式”的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105-106页。

㉚李竞强:《“阿拉伯之春”以来突尼斯与埃及政治转型比较研究》,第58页。

㉛转引自张楚楚:《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国家建构路径:基于“突尼斯模式”与“也门模式”的比较研究》,第105-106页。

㉜朱泉钢:《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71-73页。该书也是目前国内研究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的唯一的专著,作者主要以埃及、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四国为案例,对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军政关系的演变、类型和特征进行了研究。

㉝Steven A. Cook, *Ruling but Not Governing: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gypt, Algeria, and Turkey*, p.14。

㉞王猛:《后威权时代的埃及民主政治建构:回顾、反思与展望》,《西亚非洲》2013年第3期,第63页。

㉟转引自朱泉钢:《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第78页。

㊱Marieke Brandt, *Tribes and Politics in Yemen: A History*

of the Houthi Conflict, London: C. Hurst & Co., 2017 p.2.

⑳朱泉钢:《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第129-147页。

㉑Robert D. Burrowes, *The Yemen Arab Republic: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1962-1986*,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p.51.

㉒朱泉钢:《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第147-155页。

㉓Ike Grawert and Zeinab Abul-Magd, eds., *Businessmen in Arms: How the Military and Other Armed Groups Profit in the MENA Region*, Lanham, Maryland: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6, p.158.

㉔萨利赫建立的平行武装力量包括萨利赫及其家族控制的共和国卫队(人数2.1万)、也门特别行动力量、内政部下设的多达五万人的准军事警察力量等。参见Michael Knights, "The Military Role in Yemen's Protest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Tribal Republic,"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6, No.2, 2013, pp.273-274。

㉕穆森为也门装甲部队总司令,来自桑汉部落,1978年萨利赫任总统之初与桑汉部落达成协议,其内容是桑汉部落支持萨利赫的总统地位,而穆森将在萨利赫之后担任总统。

㉖Michael Knights, "The Military Role in Yemen's Protest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e Tribal Republic,"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6, No.2, 2013, p.283.

㉗转引自张楚楚:《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的国家建构路径:基于“突尼斯模式”与“也门模式”的比较研究》,第105-106页。

㉘朱泉钢:《阿拉伯国家军政关系研究》,第158页。

㉙李亚男:《也门局势在疫情加速恶化》,《世界知识》2020年第13期,第50-51页。

㉚王建勋:《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秩序的冲击》,《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第50页。

㉛刘中民:《阿拉伯之春十年后看中东困局》,《环球时报》2020年11月3日,第14版。

㉜包澄章:《反思与进步:阿拉伯世界对“阿拉伯之春”的认知变化》,《国别和区域研究》2018年第1期,第60页。

㉝关于这四种类型的划分参见刘中民:《从族群与国家认同的矛盾看阿拉伯国家的国内冲突》,《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3期,第14-15页。

㉞刘中民:《中东变局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第19页。

㉟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Washington, D. C.: The 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Brookings, 2013, pp.1-8.

㊱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

㊲Evangelos Venetis, *The Struggle between Turkey and Saudi Arabia for the Leadership of Sunni Islam*, Athens: 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014, pp.5-8.

㊳王宇洁:《教派主义与中东政治》,《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第34页。

㊴刘中民:《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98页。

㊵吴冰冰:《中东伊斯兰教派矛盾的新变化》,《西亚非洲》2012年第5期,第42页。

㊶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p.10.

㊷Human Rights Watch, "Routine Abuse, Routine Denial: Civil Rights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Bahrain," <http://www.hrw.org/reports/1997/07/01/routine-abuse-routine-denial>, 2021-04-06.

㊸关于巴林教派问题的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第144-146页。

㊹Geneive 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 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p.24.

㊺刘中民:《试析中东变局中的教派矛盾:以巴林问题为案例的分析》,第144页。

㊻同上,第145页。

㊼汪波、王佳尼:《中东变局以来库尔德问题的新发展》,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4),北京: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226页。

㊽汪波、许超:《中东库尔德问题的新发展》,载刘中民、孙德刚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17-201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121页。

㊾唐志超:《“阿拉伯之春”背景下的库尔德问题新动向》,《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3期,第69页。

㊿Loqman Radpey, "Kurdish Regional Self-rule Administration in Syria: A New Model of Statehood and its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Law Compared to the 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KRG) in Iraq,"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6, Vol.17, No.3, p.482.

㉀汪波、许超:《中东库尔德问题的新发展》,第123页。

㉁汪波、许超:《中东库尔德问题的新发展》,第124页。

㉂刘中民:《中东变局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第18页。

㉃转引自田文林:《军队干政:中东非典型政治中的典型现象》,第34页。